

上海政法学院
树人
樹聲時入坐

蘭香欲濕衣
多野凡字

姚 涵 · 著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刘半农对 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LIUBANNONG

DUI WUSI XINWENXUE DE GONGXIA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姚 涵·著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刘半农对 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LIUBANNONG

DUI WUSI XINWENXUE DE GONGXIA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半农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姚涵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520-0910-1

I. ①刘... II. ①姚... III. ①刘半农(1891~1934)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4303 号



刘半农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著 者: 姚 涵

责任编辑: 杜颖颖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2.5

插 页: 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910-1/I·163

定价: 3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编审委员会

主任：金国华

副主任：闫立 倪正茂

秘书长：何平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华 王蔚 刘强 闫立

关保英 汤啸天 杨寅 吴益民

何平立 张森年 金国华 倪正茂

章友德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蕴含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

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祝愿《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精神,薪火传承,代代相继!

金国华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原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刘半农的文学史意义	1
第一节 刘半农生活与创作道路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被重视的与被忽略的	20
第二章 通俗小说理论与创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 1913~1917 年 小说理论和创作为中心	30
第一节 小说理论与创作背景	30
第二节 “启发民智”：小说的功用	38
第三节 小说艺术品格的提升	45
第三章 民间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建构——以 1917~1925 年诗歌创作和 理论为中心	55
第一节 歌谣运动之首倡	55
第二节 新的诗学观念的确立	67
第三节 民间语言与民歌体裁的审美认同	81
第四节 民间生活与诗意情感的真实呈现	91
第四章 实事求是的战斗精神	105
第一节 “文学改良”的实践者	106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者	121
第三节 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续	136
第五章 价值转变与道路选择	151
第一节 从“战士”到“隐士”	153
第二节 时代精神与个体价值	161
结语	170

附录一：刘半农著译小说年表(1913~1920年)	173
附录二：刘半农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诗歌、随感录及其他(1916~ 1921年)	178
附录三：刘半农发表于《语丝》的杂文、诗歌、书信及其他(1925~1929年)	182
参考文献	187

第一章 导论：刘半农的文学史意义

第一节 刘半农生活与创作道路

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提及“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①，提及民间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民歌体的新诗创作，提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为传唱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②，以及汉字“她”的创造等，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刘半农。

与刘半农同一时代的学人及后世研究者对其曾有过多重的“角色”定位：由鸳鸯派“才子”到“叛徒”，再到新文学“战士”“闯将”，最后是“五四”落潮时的“隐士”。这些说法都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刘半农人生轨辙的阶段性的特点。

那么，刘半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依，时用瓣秭、半，后改字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化名范奴冬女士等。1918年1月，当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他删去“依”的“亻”旁，正式署名“半农”。——正如后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刘半农名字号的这一改变颇具象征意味：一个“公子寻芳”的“半依”，变成了一个迹近“下里巴人”的“半农”；是字号的变更，更是意味着思想的变化。

1891年5月27日，刘半农出身于江苏省江阴县西塘街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③ 江阴是典型的水乡小城，刘半农从小养成“爱水的观念”。^④ 他的童年生活充

① 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96页。

② 刘半农：《扬鞭集》，《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8—29页。

③ 本节叙述的“刘半农生平”，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徐瑞岳编著《刘半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徐瑞岳编《刘半农年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徐瑞岳著《刘半农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江著《刘半农传》，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刘半农八九岁时非常喜欢画画，父亲很高兴，为了培养他，特意请来懂画的朋友加以指点。对此，他回忆说：“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番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刘半农：《北大河》，《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145页。

满乐趣：

我是一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鸡头；蛙羹蚌曜，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中”，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①

亲切的江南水乡，培养了刘半农亲近山水、开朗豁达的性情；童年生活的片断，后来有些就被他写入了诗歌。

刘半农既没有钱玄同较为显赫的家族背景，也不似周氏兄弟曾遭家道中落，刘半农的父母均出身贫寒。父亲名玉珂，字宝珊，五六岁时从一户本家的贫农家庭被祖母过继，靠祖母纺纱织布得以读书，后考上秀才，一生在家乡创办私塾。母亲身世更为凄苦，幼时家贫，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此后生活更难维持，终为外祖母遗弃。一个严冬的早晨，祖母将冰河中的母亲救起，领回家当童养媳养育，直至长大与刘宝珊成婚。刘半农很早就思考过母亲的这段幼年遭遇，他能体察外祖母当年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没有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外祖母一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② 观察社会、体会人生，当然可有不同角度，不同的思考角度与立场往往会造成同一时代人与人之间思想境界方面的差异。刘半农早年这种“眼光向下”的思考角度，与他后来的文学、人生立场，当不无关联。

这个家庭虽然清贫，却不曾忽视子女的教育，刘半农及他的两个弟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后兄弟三人在各自从事的领域均有所建树，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刘氏三杰”：二弟刘天华音乐天资并非超群，但他勤奋过人，以“非常人所能及”之“恒”与“毅”，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的艺术理想，终“卓然成家”。^③ 三弟刘北茂初习英文，后在长兄劝导之下，为纪念英年早逝的二哥，决心继承二哥遗志，毕生从事民族乐曲创作与教学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 刘半农非常推崇二弟天华会通中西乐之举：“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殊，理趣无异，而当时士子，每重新声，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望他人。”在一个重“西学”的年代，中国音乐界同样将眼光更多投向西方音乐。在“西乐”备受推崇的时代风尚中，刘天华却始终以民族音乐为本，以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来改进二胡演奏，使得“地本庸微”的二胡从此成为乐器之“上品”。钱穆曾经形容，天华“在北平奏二胡，创新把势，一时轰动全国慕效”。^⑤

① 刘半农：《北大河》，《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145页。

② 刘北茂：《纪念长兄半农先生》，《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48—149页。

③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300页。

④ 刘北茂：《纪念长兄半农先生》，《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48—149页。

⑤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260页。

这种以民族音乐为根基的艰难尝试，一直得到了长兄的赞赏与支持。1929年年底，刘半农为二弟刘天华所编的《梅兰芳歌曲谱》作序，对二弟编撰曲谱的工作加以肯定，也借此机会讨论中国戏曲的问题，其间寄托了他对于“中国歌剧”振兴的希望。1930年春天，梅兰芳先生就是带着这本曲谱，率团远赴美国，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市演出京剧，获得巨大成功，一时轰动海内外。在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数十年里，天华曾数度走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创立“国乐改进社”；半农曾采集船夫村妇口中歌谣，一生钟情方言俗曲，创造花样翻新的新诗；甚至三弟北茂也放弃最初的英文研究，改治国乐，躬耕不辍——这一切当不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说，兄弟三人的文化理想有着同一的内在推动力——对民间文化的深沉热爱。的确，刘半农毕生重视民族文化，甚至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又费数十年之功借他山之石攻“中国音韵学”，须臾未曾离开民族本土文化的沃土。

三兄弟之中，刘半农天资最为聪慧，颇为人称道。1932年，二弟天华不幸英年早逝，刘半农撰写悼念文章，其间谈及自己小学和中学之时的过人之处：“时余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流露，恒为同学所倾。天华课业不异于人，而朴讷寡言语孳兀兀，纯乎得学子之正。以是先宝珊先生及诸师长，每愿天华能兼余之颖悟，余能兼天华之沉潜，方为两全也。”^①刘半农较同龄的孩子多了活泼和勇敢，敢想也敢做，这是他小时看起来不够沉稳持重的主要原因。

刘半农4岁起即以父亲的识字教育开蒙，6岁入私塾，已能咏诗，还可作一些三四字的短对。1901年，清廷于风雨飘摇之际被迫实施“新政”，这一年刘半农11岁，进入父亲和杨绳武等人创立的翰墨林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校位于刘家东大门前面，根据刘半农的叙述，这所小学堂名为私塾，但已有不同于传统私塾的教育内容出现：

我在十一岁时，进了个似是而非的小学堂，那学堂的课程上半天全读中文，要熟读《三苏策论》或《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一二篇，要看《纲鉴易知录》十页；下半天是英文和算学各两点钟，所读的英文是《华英进阶》和《英文初范》《英文法程》，算学所用的书，是《九数通考》《数理精蕴》《代数术》；晚上还要看些《西学大成》《泰西新史揽要》《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以备三八文期上抄袭之用……^②

刘半农在翰墨林小学开始初步了解西方语言、文化及历史。他勤奋好学，加上天分过人，国文和英语学得最好。最难得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常能发人所未能发

^①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299页。

^② 刘半农：《南归杂话》，1918年8月《新青年》5卷2号。

之言,让杨绳武先生刮目相看,对同事感叹此“小子”前途不可限量。^①翰墨林小学校虽小,有些老师却颇有创见,其中有两位老师对刘半农影响很大:一位就是对刘半农赞赏有加的杨绳武先生,杨先生的文笔让刘半农获益良多;另一位国文教师刘步洲,自定了标点符号,力图改变竖写文章不带标点的状况,虽然有些方法颇倾向于个人喜好,缺乏可行性,但这一想法给年幼的刘半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也曾回忆道:“先业师刘布洲先生尝定单线在右指人名,在左指官名及特别物名,双线在右指地名,在左指国名朝名种族名,颇合实用。惜形式不甚美观,难于通用。”^②刘半农日后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的先锋,创制新式标点,离不开这位老师当初的启发之功。

刘半农入中学的年代,传统的学制体系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成为历史的必然。1902年8月15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学校系统文件,这一未曾实施的“壬寅学制”成为新学制的先声。1903年,张之洞奉命入京主持新学制的制定。1904年,清政府变通科举制度,开始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作为补充。就在同一年,清政府批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一时间,全国上下大举兴办新学,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学校均得到兴建。1905年,面对日渐紧迫的时局,光绪帝正式下诏立停科举。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学制的颁行,构成晚清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除旧”与“布新”的最大举措。1907年刘半农入读常州府中学堂,该学堂就是“癸卯学制”颁行之后新办的中学堂。^③

1907年11月3日,常州府中学堂举行了第一次入学考试,由校长屠宽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为国文、算术、历史以及地理,一日之内考毕。其时,常州府管辖八个县,江阴即为其中一县。在180名被录取的考生之中,刘半农高中江阴县第一名。按“癸卯学制”的规定,中学堂学制为五年。开学未及半月,学校考虑学生程度参差

^① 有一次,国文老师出题《论孟尝君》,同学们按照传统看法,都在文中推崇孟尝君为“得士”之主,但惟有刘半农在文中提出反语:“岂有鸡鸣狗盗之雄出入其门而谓之‘得士’乎?”表现了他独特的见解。为此,国文教员杨绳武、郑子仰对其甚为器重,曾在文中批阅:此小子不同凡响,其前途无可限量。参阅谷怀:《刘半农和刘天华》,江阴县文化馆刊物《江风》,1979年10月。

^②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③ “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并且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学制,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被誉为我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癸卯学制”基本模仿日本现代教育体系,也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强调以儒家伦理陶冶学生品行,辅以西学技艺,并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所设课程十分突出道德教育,中小学均把修身列为课程之首,并特设读经讲经课。以中学堂为例,其学习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日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2门,每周上课36点钟,读经讲经为每周9点钟。有关晚清教育改革,可参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第370—376页的相关论述。

不齐,举行分班考试,成绩优秀者可直接读二年级。刘半农在这次分班考试中又获第一,被编入二年级一班,四年即可毕业。接下来,在年底的学期考试中,刘半农第三次得了第一。这样一来,全校师生皆为之震惊,刘半农三月之内三获第一的惊人表现也一时传为佳话。刘半农常州府中学堂的校友,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有“国学大师”之誉的钱穆晚年曾回忆这段同窗往事:“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面为荣。”^①

刘半农成绩出众,国文更是无人可比。常州府知府翰林御史黄步瀛曾到中学堂出题考试,刘半农的国文又得到第一。作为对优秀学生的奖励,黄知府捐赏他一年的学费。除此之外,刘半农还接受了科学教育。比如,他不到半月就习完《数学精详》,还学习了《河图洛书》和《周髀算经》等古代算术书。虽然刘半农觉得似懂非懂,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音律,制造声调推断尺等科学仪器,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②

刘半农并非读死书的学生,他课上勤思好学,课下游乐也有过人之处。刘半农幼年起就有画画的爱好的,喜欢描摹景物,捕捉色彩。1908年,常州府中学成立了中学堂游艺部,刘半农积极参加。从此,他利用课余时间摆弄起照相机,这一兴趣伴随了他一生。值得称道的是,刘半农以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将本属个人爱好的摄影提升到艺术研究的境界,最终在中国早期摄影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1925年,刘半农加入了北京摄影团体“光社”。1927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艺术专著——《半农谈影》。此外,他还于1927年、1928年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北京光社年鉴》。该书第一册销路非常好,在为《光社年鉴》二册所作的序中,半农谈及摄影艺术要重视个性情趣以及民族性:“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③即便是这样一项“副业”,也贯彻了刘半农对于艺术创造的见解——强调“个性”“自我”。刘半农生活的时代,摄影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大多数人对摄影的认识多停留于“复制”的层面,比如钱玄同就认为傻瓜才学摄影。这样的看法虽然极端,但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摄影的偏见。刘半农反对机械的复制,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大都充满个性色彩,擅长捕捉灵动的生命形态。这些注重艺术创造的理论,当属个性主义美学思想的一个方面。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72页。

② 朱江:《刘半农传》,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9页。

③ 刘半农:《光社年鉴二集序》,《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141页。

刘半农入读常州府中学堂期间,时逢辛亥革命前夜。据校史记载:

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教员中还有几位同盟会员和思想进步的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常常向学生热情宣扬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主爱国思想(原文如此,似为“思想”之误——引者注),积极参与地方上的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已在学校中广为传播。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屠元博等人结束了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会议后,立即返回常州,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响应之策,又分赴上海、苏州等地联络同志。^①

受环境的影响,刘半农内心也朦胧地孕育了一些带有“革命”色彩的思想。钱穆先生回忆,有一次,刘半农等几个同学曾邀他于一教室密谈:“彼详言太湖形势,沿苏州无锡宜兴一带港汊分歧,陆上多山岩洞穴,可躲藏。湖中渔民多举家住大艇中,终年不登岸,即在其艇设家塾教其子女,此辈宜可晓谕以民族大义。我辈果有志革命事业,太湖应可为一理想根据地。”^②学生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是否践行倒并非重点;沾染时代风尚,沟通时代风习,刘半农此后的人生道路,似乎也隐约可见。

刘半农中学时代“革命”色彩最浓的一次行动,要算参与毕业那年的“退学”风波。常州府中学堂是在“癸卯学制”体系下建立起来的中学堂,课程设置非常强调修身课的比重。学校规定修身课的教材为“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以及《在官法戒录》。读经讲经课讲授《春秋》《左传》和《周礼》,儒学仍是学生研习的主要内容。如此的课程安排在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同学中引起了反感。1910年底,四年级年终大考即将举行之际,全校四年级学生集议,希望学校明年课程有所改动: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等。他们公推刘半农与钱穆、张寿昆、屠孝实等五人为代表,晋谒校长屠元博。^③这次的事件之后,刘半农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1910年六月,刘半农回家乡江阴,与朱惠女士完婚,婚后十余日母亲病故。回

① 《江苏省常州中学校史》,转引自徐瑞岳编:《刘半农年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页。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72页。

③ 钱穆曾回忆这次“退学”风波:“当余班四年级年终大考前,全级集议,欲于明年课程求学校有所改动。主要如减去修身课,增希腊文课等。公推代表五人,余亦欲也。晋谒监督。元博师言,课程规定乃学校事,诸生意见可供参考。五代表求元博师明确答复。元博师问余:‘闻汝读英文科不用心,何以又要增读希腊文?’余答:‘此乃全班同学公意,非余一人意。’元博师又问:‘修身课每周仅一小时,何以要减去?’诸代表述士卒师上堂语,谓修身不由语言传授。然卒不得结论。进退三数,不蒙允许。诸生遂议由五代表上全班退学书,以为要挟。元博师告五代表,退学乃学生各别个人事,集体退学,不在学校规则内。诸生遂又集议,全级排班见监督,逐一填写退学申请书。元博师接见于一大会议室内,面加训悔,历一小时。”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54—55页。

乡后，刘半农受翰墨林小学校长王翊唐的邀请，回到母校教书。闲暇的时候，刘半农还和吴研因等人一起创办、编辑《江阴》杂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刘半农终于按捺不住投身革命浪潮的热情，不顾父亲和新婚妻子的反对，坚决投身革命军，“北走清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①。就在做文牍工作期间，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失败，刘半农感到无比失望，军队的混乱不堪也让他认识到这里并非想象中建功立业的所在，于是又回到了江阴。

1913年春天的二三月间，刘半农带着二弟刘天华一起来到上海，开始了数年“卖文为活”的生涯。后来，刘半农的这段上海滩生活为很多新文学参与者所诟病，认为刘半农此时的声名是与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本书试图说明的，这段生活和创作经历，恰恰开拓了刘半农诗文创作的视野，也为他诗文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到上海谋生伊始，兄弟俩加入了开明剧社^②。这是一个演出新剧的剧社，领导者是话剧表演艺术家李君磐^③。刘天华在剧社里演奏西乐，刘半农当剧本编辑，曾经编译《好事多磨》等剧本，也曾参演一些剧目。剧社是个“小社会”，其间鱼龙混杂。有一次，演洋装戏所需的昂贵假发丢失了，一时间，这对平日与大家有些格格不入的兄弟，就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刘半农忍无可忍，当即当掉自己的结婚戒指和天华的手表，明察暗访，终于找出了真正的窃贼方某。后来，刘半农将这次的“假发事件”写成了小说。^④

在开明剧社的一次演出中，经李君磐介绍，刘半农结识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徐卓呆^⑤。徐半梅的出现对于刘半农正式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时徐半梅刚入《时事新报》，开始提倡新剧。赵苕狂曾谈到，此时的徐半梅躬身新

①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300页。

② 按照徐半梅的描述，开明剧社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剧团附有乐队；第二，擅演洋装戏，“正场且角史海啸，是个高头大马型的体格，扮洋装的女角，妙到极点”；第三，这个剧团到过南洋群岛和日本，到日本演出比梅兰芳、小杨月楼、黄玉麟三批人马还早。参见徐半梅：《顽童刘半农》，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6页。

③ 根据徐瑞岳的考证，李君磐出身南京格致书院，后来曾到北京办过江苏旅京公学。后来在张诒儿办的残废养老院当秘书，1955年病逝。参见徐瑞岳：《刘半农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33页。

④ 刘半农：《假发》，《小说月报》4卷4号，1913年8月。

⑤ 徐卓呆(1881~1958年)，名傅霖，字卓呆，号筑岩，别名徐半梅、徐梦岩阿呆、李阿毛等，江苏吴县人。近代小说家、编辑，尤擅长滑稽戏和小说创作。徐卓呆曾留学日本，回国后起初致力于体育教育，后转向新剧事业。赵苕狂为其立传，谈及徐半梅的小说创作时称道：“君少时已喜为小说，近年致力尤勤，散见于各杂志中者，殆不下百余篇，以滑稽一类为多，而隽永有味，弥含哲理，实能脱寻常滑稽小说窠臼而自成家数者。”（参见《卓呆小说集》，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刘半农开始走上翻译和创作生涯，与徐半梅的提携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

剧事业,将原来“鼓吹旧剧甚力”的郑君秋也拉进了新剧的事业中来——徐半梅“以为能开通社会者,莫新剧若耳,当一提倡之。……未几,正秋亦为所动,竟弃旧剧不谈,而从事于新剧,君亦贡身其间,擘画讨论,弥著勤劳,复著成剧本多种以饷之,新剧事业遂赖之蓬勃以兴”。^①

后来,徐半梅撰文回忆其时与刘半农交往的始末:一次,在开明剧社演出的后台,李君磐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让他帮忙化妆,并介绍说“这是一个顽童”,徐半梅就给他化了一副“顽皮面孔”。后经打听知道这个“大孩子”姓刘,江阴人。一个月后,徐半梅收到刘半农的来信:

……就是那个姓刘的江阴人写给我的。他见我在时事新报上译过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他要打听我根据的原本是否英文,他信上的署名叫刘半农。我便告诉他:“我是从日本书译的。”又过了几天,刘半农寄了两篇译的小说稿给我,托我在什么地方发表。我把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一篇给他介绍到中华书局的《小说界》杂志去。

从此,他常有小说托我代为介绍。后来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我辞去了时事新报而入中华编辑部,同时也把刘半农介绍了进去。我们相处有好几年,直到中华编辑部紧缩,大家才分手。刘半农就上北方去了。其时他才改名刘半农。^②

刘半农在上海过的是底层的“草根”生活,“辛勤所得仅能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兄弟二人“到了冬天,两人仅有一件棉袍,一人穿了它出门,另一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取暖”。^③ 半农从事翻译写作,一半源于个人兴趣,一半恐怕也是为生计所迫。经徐半梅(卓呆)介绍,刘半农开始任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中华新报》创刊后任特约研究员。从这时起,刘半农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

1913年10月8日,刘半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用个人名义发出“征联启事”,以“余渔鱼于圩”五个同音平声字作上联,公开征求下联,一时引起轰动。紧接着,10月13日,《时事新报·杂俎》又刊登了他的一篇百字小说《秋声》。这篇“小小说”矛头直指时政,抨击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黎民百姓的丑恶行径。这次的投稿居然获得该专栏第三十三次悬赏的“一等奖”,这给刘半农以莫大的鼓励,从此,他笔

① 赵苕荻:《徐卓呆传》,参见《卓呆小说集》,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

② 徐半梅:《顽童刘半农》,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6页。

③ 刘北茂:《纪念长兄半农先生》,《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50页。

耕不辍，“半依”——这一“你依我依”“红袖添香”式的笔名，常常出现在《小说界》《中华小说界》等刊物之上。其间，他也偶尔用“半”“瓣秭”等笔名。在上海的这几年里，刘半农以“半依”这一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和创作小说多达四十多部，共计百万余字。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小说海》以及《礼拜六》等刊物上。其时，刘半农结识了徐卓呆、包天笑、张恨水^①、严独鹤、程小青以及周瘦鹃、向恺然等鸳鸯派的代表人物。

刘半农最早翻译的作品是英国狄更斯的《伦敦之质肆》(1914年8月1日《中华小说界》1卷8期)、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此何故耶》(1914年11月1日《中华小说界》1卷11、12期连载)以及丹麦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刘半农将其改写为小说《洋迷小影》，发表于1914年7月1日《中华小说界》1卷7期)。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德富芦花的《悯彼孤子》(1915年5月1日《中华小说界》2卷5期)、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暮寺钟声》(1915年12月1日《中华小说界》2卷12期)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5月，刘半农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人》(1916年5月1日《小说海》2卷5号)，这是高尔基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刘半农还与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年中华书局版)、《黑肩巾》(1915年7月1日《中华小说界》2卷7期)、《猫探》(1917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华书局1917年版)和《帐中说法》(连载于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二卷3、4、5期)等。

要成为好的译者，既需要有发现佳作的眼光，又需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而在翻译选材方面，刘半农有很好的判断力。即使将刘半农放到现在的译家中间，他也能称得上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译者。比如，他最早翻译了散文诗，并最早向国内引进了“散文诗”概念。他最早开始关注俄国屠格涅夫和印度泰戈尔的散文诗，并向国人介绍了他们的作品，而这两位恰恰是东西方公认的散文诗大家。1915年，刘半农从英文转译了俄国屠格涅夫的4篇散文诗——《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②(现通常译作《乞丐》《玛莎》《愚人》《菜汤》)。1918年，又翻译了泰戈尔4首散文诗：《Tagore诗二首》——《恶邮差》和《著作资格》^③以及《海滨》和《同情》。^④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印度歌者拉

^① 直到1934年去世前几个月，刘半农与张恨水仍有往来，有1月4日日记记载：“与牧野、颖孙(荪)同住方家胡同看恨水，值出，入其书斋中小坐。”参见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37页。张恨水在刘半农去世后，为其撰悼念文章《哀刘半农先生》，《人间》1935年第27期。

^② 此四篇译文，以《杜瑾讷夫之名著》为总题，发表于《中华小说界》二卷七期，1915年7月。当时刘半农尚未将这些作品归为“散文诗”。“杜瑾讷夫”为“屠格涅夫”的旧译。

^③ 1918年《新青年》5卷2号。

^④ 1918年《新青年》5卷3号。